

小学高年级学生校园欺凌受害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

刘彤, 高媛, 吴晶*

绍兴大学心理学系, 浙江绍兴, 中国

*通讯作者

【摘要】为探讨小学高年级学生校园欺凌受害、心理弹性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 本研究对绍兴市 464 名五、六年级学生开展问卷调查。男生欺凌受害程度显著高于女生; 校园欺凌受害与心理弹性、生活满意度呈显著负相关, 心理弹性与生活满意度呈显著正相关。此外, 心理弹性在欺凌受害与生活满意度间起显著中介作用。校园欺凌不仅直接降低学生生活满意度, 还通过削弱心理弹性产生间接负面影响。

【关键词】校园欺凌受害; 生活满意度; 心理弹性; 小学高年级学生

1. 问题提出

校园欺凌是一种具有特定目标的理性行为, 是儿童青少年群体中高发的负性人际互动事件[1]。校园欺凌受害已被证实与儿童青少年多种心理健康问题密切相关, 是学龄群体心理发展的重要风险因素[2]。近年来国内外研究显示, 我国城市小学生校园欺凌受害检出率达 51.3%, 农村小学生受害检出率区间为 41%~68%[3-4]。校园欺凌受害呈现出发生率高、低龄化凸显的特征[5]。小学高年级是青少年儿童社会化发展的关键时期, 该阶段学生的自我意识快速发展, 对同伴评价与群体接纳的敏感度显著提升[6]。以往关于校园欺凌的研究, 大学生及初中生群体是重点关注对象。然而有研究表明, 大多数受访对象自小学时期就有校园欺凌受害经历[7]。校园欺凌是一个长期且可能产生深远影响的过程, 个体年龄越小, 校园欺凌受害的影响就越严重[8-9]。校园欺凌受害给小学高年级受欺凌者带来的心灵创伤, 对其心理适应的影响相较于其他年级更为持久[10]。另外, 有研究证实小学阶段男生在语言、身体等显性欺凌中的受害程度显著高于女生[11], 提示该群体欺凌受害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作为校园场景中的持续性负性经历, 欺凌受害会导致受欺凌儿童出现焦虑、抑郁等内化问题[12], 其主观幸福感水平会随之降低[13]。而这种消极影响会蔓延到整个校园环境中, 令其他学生处于不安情绪, 同样不利于他们的学习和生活[6]。因此, 针对小学高年级学生群体开展校园欺凌相关研究, 对校园欺凌的低龄化防治具有重要意义。

生活满意度是个体基于自身标准对生活

整体质量的认知评价, 是构成个体自我幸福感的成分内容之一[14], 与心理健康结果密切相关[15]。生活满意度能正向预测社会适应能力。生活满意度较高的个体, 通常表现出更低的心理脆弱性, 面对压力时的应对能力也更强[16]。依据布朗芬布伦纳人类发展生态学理论, 学校是青少年儿童日常活动的核心微系统。以往研究结果表明, 大多数青少年儿童的总体生活满意度水平与其所在的重要生活领域(家庭、学校、朋友等)正向相关[17]。因此, 校园生活领域体验的好坏关乎学生对总体生活的满意度水平。校园欺凌受害是校园场景中积重难返的负性生活事件, 遭受欺凌的青少年儿童会对生活产生无力和无意义感[18]。根据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 青少年儿童遭受欺凌时, 基本安全感无法得到满足, 更高层次的归属感与爱也会随之受阻, 常表现为生活满意度下降, 自我幸福感降低[18]。生活满意度同样是预判个体行为倾向的重要指标[19]。依据一般攻击模型[20], 由校园欺凌受害致使的生活满意度降低可能引发校园中的同伴冲突、欺凌实施、社交退缩等消极行为[19]。小学高年级阶段, 学生的生活场景高度聚焦校园。相较于其他年龄群体, 校园欺凌受害经历对小学高年级学生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可能更具特殊性[21]。已有研究证实, 负性生活事件与青少年生活满意度呈显著负相关[22], 但现有研究中针对校园欺凌受害对小学高年级学生影响的探讨较少。因此, 亟需针对该群体开展相关研究。

从风险与保护因素视角来看[23], 负性生活事件对个体发展的影响, 往往受到保护性心理资源的调节。心理弹性作为个体在逆

境中维持或恢复良好适应状态的能力[24],被认为是个体应对负性事件的重要保护性心理资源[25]。根据心理防御机制[26],心理弹性较高的学生在面对负性事件时能够更好地应对和适应,心理弹性可以减少校园欺凌受害的负面影响[27]。然而,Kumpfer心理弹性过程模型指出[28],心理弹性是个体与环境动态互动中形成的可塑心理资源,非固定特质[29]。虽然高水平的心理弹性能缓冲负性经历对个体心理适应的不良关联,但逆境环境会消耗个体的心理弹性资源。持续性的欺凌受害经历可能引发儿童的无助感、自我否定及消极情绪体验[30]。长期的压力体验会削弱积极应对能力,最终导致心理弹性水平下降[31]。因此校园欺凌受害可能与儿童心理弹性水平呈显著负相关。另一方面,心理弹性能帮助个体采用积极应对策略,增强情绪调节能力,并对生活事件进行更为积极的认知加工[32];心理弹性水平较高的个体,能有效减少负性情绪的积累,提升对生活情境的积极评价,维持较高的生活满意度[33-34]。相关研究亦表明,心理弹性在负性生活事件与心理适应之间发挥中介或缓冲作用[35],但现有研究尚未明晰小学高年级学生群体中校园欺凌受害、心理弹性与生活满意度的关联路径。基于上述理论与实证依据,本研究认为,小学生心理弹性在校园欺凌受害与生活满意度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综上所述,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 (1)小学生校园欺凌受害程度存在性别差异,男生校园欺凌受害程度高于女生。
- (2)小学高年级学生校园欺凌受害与生活满意度呈显著负相关。
- (3)小学生心理弹性在校园欺凌受害与生活满意度之间起中介作用。

2.对象、方法与数据处理

2.1 对象

表 1.人口学变量统计表

变量	类别	人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259	55%
	女	205	45%
年级	五年级	305	65%
	六年级	159	35%
是否独生	独生	111	24%
	非独生	353	76%

采用整群抽样法,选取绍兴市某小学五、六年级全体学生作为本研究对象。本研究共回收有效问卷 464 份。全部被试中,女生 205 名,男生 259 名;五年级学生 305

名,六年级学生 159 名;独生子女 111 名,非独生子女 353 名。样本在性别、年级及家庭结构等方面分布较为均衡,能够较好反映小学高年级学生群体的基本特征。详见表 1。

2.2 方法

1.校园欺凌受害量表采用谢家树等人修订的《特拉华欺凌受害量表(学生卷)》进行测量[36]。原量表包含身体欺凌、语言欺凌、关系欺凌、网络欺凌 4 个维度。考虑到小学高年级学生网络欺凌发生率较低,且网络欺凌的发生机制与校园内欺凌存在差异,本研究仅保留身体欺凌、语言欺凌、关系欺凌 3 个维度,共 12 个条目。采用李克特 6 点计分法(1 表示“从未发生”,6 表示“每天发生”),总分为各条目得分之和,得分越高表示校园欺凌受害程度越严重。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克隆巴赫 α 系数为 0.897。

2.生活满意度量表采用 Diener 等人编制的《生活满意度量表》进行测量[14]。量表包含 5 个条目,用于评估个体对自己生活的整体认知评价,采用李克特 7 点计分法(1 表示“非常不同意”,7 表示“非常同意”)。各条目累计分越高,代表生活满意度越高。量表包括对自己生活的总体评价、生活的各个方面的满足感以及对未来的期望等方面的内容。本研究中量表的克隆巴赫 α 系数为 0.852。

3.心理弹性量表采用关啟亮等人在 Connor-Davidson 心理弹性量表(CD-RISC)[37]基础上修订的《心理弹性量表简版(CD-RISC-10)》进行测量[38]。量表包含 10 个条目,包含坚韧性、乐观性、力量性 3 个维度,用于评估个体在面对困难时的心理弹性,包括应对逆境的能力、情绪调节、积极思维等方面内容,采用李克特 5 点计分法(1 表示“从不”,5 表示“总是”),各条目累计分越高表示心理弹性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克隆巴赫 α 系数为 0.933。

2.3 数据处理

本研究通过问卷星平台进行问卷发放与回收,使用 SPSS 27.0 统计分析软件进行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及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在此基础上,采用 PROCESS v4.1 程序对心理弹性在校园欺凌受害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中介作用进行检验。

3.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为检验自我报告法可能带来的共同方法

偏差, 本研究采用 Harman 单因子检验评估共同方法偏差[39]。结果显示, 第一因子的解释率为 35.209%, 低于临界标准 40%, 表明本研究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描述性统计

校园欺凌受害、心理弹性和生活满意度的均值分别为 1.385、3.650 和 5.175, 标准差分别为 0.551、1.005 和 1.345, 详见表 2。

表 2.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维度	N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方差
语言欺凌	464	6.000	1.000	1.539	0.738	0.545
身体欺凌	464	6.000	1.000	1.299	0.499	0.249
关系欺凌	464	6.000	1.000	1.316	0.593	0.352
校园欺凌受害	464	6.000	1.000	1.385	0.551	0.303
力量性	464	5.000	1.000	3.551	1.100	1.211
乐观性	464	5.000	1.000	3.646	1.107	1.227
坚韧性	464	5.000	1.000	3.711	1.052	1.106
心理弹性	464	5.000	1.000	3.650	1.005	1.011
生活满意度	464	7.000	1.000	5.175	1.345	1.808

3.3 性别差异分析

以性别为分组变量, 对各变量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 欺凌受害总分及语言、身体维度在性别上存在显著差异 (p

<0.01)。表现为男生受害程度显著高于女生, 关系欺凌、心理弹性及其各维度、生活满意度在性别上均无显著差异 ($p>0.05$)。详见表 3。

表 3.校园欺凌受害、生活满意度、心理弹性的性别差异检验结果

变量	组别 (M±SD)		t	p
	男性 (n=259)	女性 (n=205)		
语言欺凌	1.642±0.848	1.409±0.545	3.592	<0.001
身体欺凌	1.380±0.590	1.196±0.323	4.272	<0.001
关系欺凌	1.329±0.634	1.299±0.538	0.547	0.584
校园欺凌受害	1.451±0.632	1.301±0.412	3.064	0.002
力量性	3.608±1.106	3.480±1.091	1.243	0.214
乐观性	3.664±1.142	3.622±1.065	0.407	0.684
坚韧性	3.767±1.071	3.640±1.025	1.291	0.197
心理弹性	3.699±1.024	3.589±0.980	1.173	0.242
生活满意度	5.100±1.388	5.269±1.286	-1.345	0.179

3.4 校园欺凌、生活满意度、心理弹性的相关分析

通过相关分析发现, 小学生校园欺凌受害与生活满意度呈显著负相关 ($r = -0.315$, p

<0.01)。心理弹性与校园欺凌受害之间为显著负相关 ($r = -0.304$, $p<0.01$)。生活满意度与心理弹性之间为显著正相关 ($r = 0.583$, $p<0.01$)。详见表 4。

表 4.校园欺凌受害、生活满意度、心理弹性在学生的相关性分析

变量	校园欺凌受害	心理弹性	生活满意度
校园欺凌受害	1		
心理弹性	-0.304**	1	
生活满意度	-0.315**	0.583**	1

(注: *表示 $p<0.05$, **表示 $p<0.01$, ***表示 $p<0.001$)

3.5 心理弹性的中介效应检验

以校园欺凌受害为自变量, 心理弹性为中介变量, 生活满意度为因变量进行中介效应的检验。结果如表 5, 可知间接效应、直接效应、总效应差异比较的 95%置信区间均不包含 0, 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56.471%。表

明心理弹性在两者关系中发挥重要的中介作用。

基于前述各项数据的整体分析, 心理弹性在校园欺凌受害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中介效应的模型如下图 1 所示。

表 5.心理弹性的中介效应检验

效应	路径	效应值	BootSE	95%CI 下限	95%CI 上限	效应占比/%
直接效应	校园欺凌受害→生活满意度	-0.333	0.156	-0.655	-0.061	43.529
间接效应	校园欺凌受害→心理弹性→生活满意度	-0.432	0.077	-0.607	-0.309	56.471
总效应	校园欺凌受害→生活满意度	-0.765	0.176	-1.151	-0.465	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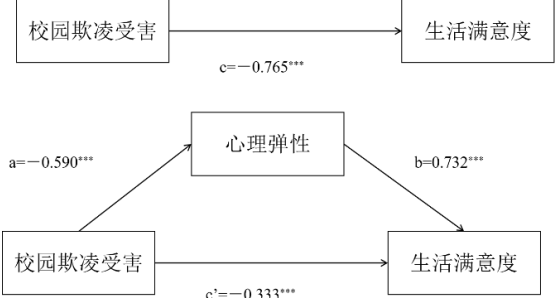


图 1.校园欺凌受害与生活满意度的中介效应模型

4.讨论

本研究从发展阶段与保护性资源视角，揭示了小学高年级阶段校园欺凌受害影响生活满意度的心理机制。小学生校园欺凌受害发挥直接作用和心理弹性中介效应影响生活满意度，心理弹性能够有效缓解校园欺凌受害者对生活满意度的负面影响。且心理弹性水平越高，个体的生活满意度越高。这一结果证实了心理弹性在应对负性压力中的保护性作用[24]。

4.1 校园欺凌受害的性别差异结果分析

本研究显示，小学高年级男生的语言欺凌、身体欺凌得分及欺凌受害总分均显著高于女生，关系欺凌无显著性别差异。这一结果验证了研究假设 1，与已有研究的稳定共识一致[11]。从发展视角来看，这一结果的形成与小学阶段性别角色的社会化引导密切相关[40]。小学阶段男生在社会化过程中更易被引导采用外显、对抗性的行为方式。面对同伴冲突时倾向于以直接的身体或言语形式表达，因此更易卷入显性欺凌的受害情境。女生的冲突表达则更具隐性特征，其欺凌相关经历多体现为关系排斥、语言暗示等隐蔽形式。较少出现直接的身体与语言攻击，因此在显性欺凌的受害程度上显著低于男生。本研究未发现心理弹性及其各维度、生活满意度在小学高年级学生中存在显著性别差异。这一结果可能与当前中小学性别教育的逐步普及、心理健康课程的常态化开展相关[41]。

4.2 校园欺凌受害、生活满意度与心理弹性的关系

本研究结果显示，小学高年级学生校园欺凌受害、心理弹性与生活满意度三者间存在显著两两相关。校园欺凌受害与生活满意度呈显著负相关，校园欺凌受害与心理弹性呈显著负相关，心理弹性与生活满意度呈显著正相关，验证了研究假设 2，与之前的研究结论一致[22]。

从布朗分布伦纳人类发展生态理论来看，小学高年级学生的日常生活微系统集中于校园，负性校园体验会泛化到其对整体生活的认知[17]。他们对生活整体质量水平的评价，最终会影响主观幸福感的水平的[13]。也就是，学生的欺凌受害程度越高，对整体生活质量的认知评价越低。从风险与保护因素视角来看[23]，校园欺凌受害与心理弹性的显著负相关表明，欺凌受害程度越高的小学高年级学生，心理弹性水平越低。小学高年级儿童心理弹性的塑型发展依赖稳定、安全的校园环境与正向的同伴互动[42]。持续性欺凌受害会迫使儿童将心理能量集中于应对负性体验上[27]。儿童容易陷入自我否定的消极认知，难以发展出积极应对逆境的能力，导致心理弹性水平下降，甚至陷入“欺凌受害—心理弹性下降—持续受害”的不利循环。心理弹性与生活满意度的正相关，一方面印证了心理弹性作为核心保护性心理资源的价值[24]。另一方面，心理弹性水平较高的儿童，具备更成熟的情绪调节能力与积极认知加工模式[27]。面对欺凌等负性事件时，能通过积极的应对策略，减少负性情绪的积累[32]。这类学生也更容易捕捉到校园与家庭中的正向体验，阻断欺凌带来的负性认知泛化到整体生活[43]，维持对整体生活的高满意度评价。

4.3 心理弹性的中介效应结果分析

研究结果显示，心理弹性在校园欺凌受害、生活满意度之间的中介作用显著。说明校园欺凌受害除了可以直接预测生活满意度之外，也可以通过降低心理弹性水平来影响小学高年级学生的生活满意度，验证了研究假设 3。风险与保护因素理论指出，个体经历的压力生活事件越多，其心理弹性水平越

低。而负性生活事件对个体发展的影响,往往会受到保护性心理资源的中介调节[23]。由此可知,作为小学高年级学生校园场景中典型的持续性负性事件,校园欺凌受害的程度越高,学生可调用的保护性心理资源就越少,对心理弹性的侵蚀作用就越显著。因此,当学生长期处于欺凌受害的压力情境中时,由于心理弹性水平降低,个体不能成功调用自身的各种资源应对负性生活体验[44],最终会形成生活满意度降低的局面。而且较低的生活满意度可能进一步削弱其积极期待、自我效能感和心理恢复能力,使坚韧性、乐观性和力量性等核心维度的发展持续受阻。相反,未遭受欺凌或欺凌受害程度较轻的学生,能够在稳定、安全的校园环境中完成心理弹性的塑型发展,形成成熟的积极认知模式与情绪调节能力,维持较高的心理弹性水平[45]。

由结果可知,心理弹性的中介效应路径与校园欺凌受害对生活满意度的直接效应路径存在显著差异。说明心理弹性是过滤校园负性体验、维持积极生活认知的核心心理屏障。根据 Kumpfer 的心理弹性框架理论,心理弹性是在保护性因素与危险性因素相互作用中不断形成和发展的[28]。当身处逆境时,个体会调动内部与外部的保护性因素抵抗压力。心理弹性较高的个体在面对压力事件时,能够通过调整对事件的认知方式,选择性关注环境中较为积极或可控的信息来减弱负性生活事件带来的消极影响。校园欺凌受害作为外部情境风险因素,对生活满意度的直接影响可能具有场景局限性。因此,面对欺凌带来的负性体验时,心理弹性水平较高的学生能够通过积极的认知重构,将负性事件限定在特定场景内,阻断其向整体生活认知的泛化[35]。而心理弹性作为个体内在的核心认知与心理特质,其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则更具全局性与稳定性。它能够通过影响个体的认知评价、情绪调节及行为应对等多个环节,持续作用于个体对整体生活质量的主观判断[33-34]。相较于直接效应,心理弹性的中介效应不仅解释了校园欺凌受害影响生活满意度的内在作用机制,更揭示了小学高年级群体中,保护性心理资源在负性校园事件与心理适应结果之间的核心传导作用。这也说明校园欺凌受害对于学生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更多是通过损耗心理弹性这一核心保护性资源实现的。

4.4 研究局限

本研究存在以下局限:第一,采用横断面设计,仅能揭示变量间的相关关系,无法推断因果方向。第二,单校抽样可能导致代表性不足。第三,本研究未纳入网络欺凌、家庭支持等重要变量。

5. 研究结论

(1) 小学高年级学生校园欺凌受害程度存在性别差异,男生校园欺凌受害程度高于女生。

(2) 小学高年级学生校园欺凌受害、心理弹性与生活满意度三者两两显著相关,其中校园欺凌受害与心理弹性、生活满意度均呈显著负相关,心理弹性与生活满意度呈显著正相关。

(3) 心理弹性在小学高年级学生校园欺凌受害与生活满意度之间起中介作用。

参考文献

- [1] Olweus D. Bullying at school: What we know and what we can do. Oxford: Blackwell, 1993:125-127.
- [2] 陈纯瑾, 邹庭瑾. 校园欺凌的影响因素及其长效防治机制构建——基于 2015 青少年校园欺凌行为测量数据的分析[J]. 教育发展研究, 2017, 37 (20): 31-41.
- [3] Liu W, Xie Y, Wang Y, et al. Uncovering the prevalence, risk factors and consequences of school bullying in China's rural primary schools. BMC Public Health, 2025, 25 (1):3952.
- [4] 常燕燕, 韩凯祥. 小学校园欺凌现象的现状与对策探究[J]. 法制博览, 2021, 37 (11): 24-26.
- [5] 刘志浩. 借力国家政策促进儿童青少年远离校园欺凌[J]. 中国学校卫生, 2025, 42 (10): 1512-1515.
- [6] 章恩友, 陈胜. 中小学校园欺凌现象的心理学思考[J]. 中国教育学刊, 2016, (11): 13-17.
- [7] Reisen A, Viana M C, Santos Neto E T.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and bullying in late adolescence in a metropolitan region of Brazil. Child Abuse & Neglect, 2019, 92: 146-156.
- [8] Salmivalli C, et al. Bullying prevention in adolescence: Solutions and new challenges from the past decade. Journal of Research on Adolescence, 2021, 31(4): 1023-1046.
- [9] Forster M, et al. Adverse childhood

- experiences and school-based victimization and perpetration.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2020, 35(3-4): 662-681.
- [10] 刘艳丽, 陆桂芝. 校园欺凌行为中受欺凌者的心理适应与问题行为及干预策略[J]. *教育科学研究*, 2017 (5): 60-66.
- [11] 吴正慧, 赵占锋, 谭咏梅, 等. 小学生校园欺凌及其与问题行为和生活满意度的关系[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23, 37 (03): 213-218.
- [12] 张文新, 谷传华, 鞠玉翠. 儿童欺负问题与人格关系的研究述评[J]. *心理学动态*, 2001, 9 (3): 215-220.
- [13] 郭夏玫, 黄靖雯. 大学生童年创伤和校园被欺凌经历与社交焦虑和生活满意度的关系[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22, 36 (9): 810-816.
- [14] Diener E D, Emmons R A, Larsen R J, et al. The 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1985, 49(1):71-75.
- [15] Satıcı S A, Uysal R, Yilmaz M F, et al. Social safeness and psychological vulnerability in Turkish youth: The mediating role of life satisfaction. *Current Psychology*, 2016, 35(1):22-28.
- [16] Diener E, Chan M Y. Happy people live longer: Subjective well-being contributes to health and longevity. *Applied Psychology: Health and Well-Being*, 2011, 3 (1):1-43.
- [17] Huebner E S, Ash C, Laughlin J E. Life experiences, locus of control, and school satisfaction in adolescence.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01, 55(2): 167-183.
- [18] 李洪巾, 陆增颜, 郭俊俏, 等. 校园受欺凌对 4-9 年级学生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C]//中国心理学会. 第二十五届全国心理学学术会议摘要集——分组展贴报告. 安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2023: 518-519.
- [19] 周印, 刘刚, 刘丽, 等. 负性生活事件对大学生网络欺凌行为的影响——生活满意度的中介作用与体育锻炼的调节作用[J]. *体育研究与教育*, 2025, 40 (06): 34-41.
- [20] 邵蕾, 张登浩. 社会排斥后的行为反应: 基于一般攻击模型[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21, 29 (06): 1163-1171.
- [21] Li D, Xu X, Liu J, et al. Cybervictimization and adjustment in late childhood: Moderating effects of social sensitivity [J]. *Journal of Applied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021, 73:101258.
- [22] 宋微. 负性生活事件与小学生生活满意度的关系: 心理弹性的中介作用及其干预研究[D].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 2022.
- [23] 熊俊梅, 王金涛. 累积风险与青少年心理健康——心理资本的调节作用[C]//中国心理学会. 第二十届全国心理学学术会议——心理学与国民心理健康摘要集.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2017: 1249-1250.
- [24] Masten A S. Ordinary magic. Resilience processes in development. *American Psychologist*, 2001, 56(3): 227.
- [25] 史光远, 崔丽霞, 雷雳, 等. 大学生的压力、情绪与心理弹性[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13, 27 (9): 703-708.
- [26] Freud A. The ego and the mechanisms of defence. London: Routledge, 2018.
- [27] Hinduja S, Patchin J W. Cultivating youth resilience to prevent bullying and cyberbullying victimization. *Child Abuse & Neglect*, 2017, 73: 51-62.
- [28] Kumpfer K L. Factors and processes contributing to resilience: The resilience framework. In: Glantz M D, Johnson J L. Resiliency and development: Positive life adaptations. New York: Kluwer Academic, 1999: 179-224.
- [29] Lee H, Cranford J A. Does resilience moderate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parental problem drinking and adolescents' internalizing and externalizing behaviors? A study of Korean adolescents. *Drug and Alcohol Dependence*, 2008, 96(3):221-230.
- [30] Bowser J, Larson J D, Bellmore A, et al. Bullying victimization type and feeling unsafe in middle school. *The Journal of School Nursing*, 2018, 34 (4):256-262.
- [31] 黄晓婷. 中学生心理复原力在同伴不良对待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关系中的调节效应及对教育的启示[D]. 天津: 天津师范大学, 2012.
- [32] 郭纪昌, 叶一舵. 青少年心理弹性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自尊的中介作用[J]. *玉林师范学院学报*, 2016, 37 (1): 132-135.
- [33] 韩梦梦, 束娇娇, 陈红. 心理弹性在大学生心理安全感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中介效应[J]. *社区心理学研究*, 2021, 11 (01): 156-170.

- [34] 张樱樱, 金蕾红, 王艳虹. 留守中学生心理健康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心理弹性的中介作用[J]. 心理月刊, 2019, 18(10): 48-55.
- [35] 谢家树, 李杰, 易嫦娥, 等. 初中生生活事件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 心理弹性的中介作用[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4, 22(04): 676-679.
- [36] 谢家树, 吕永晓, George G. Bear, 等. 特拉华欺负受害量表(学生卷)中文版信、效度研究[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5, 23(04): 594-596.
- [37] Campbell-Sills L, Stein M B. Psychometric analysis and refinement of the Conno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 (CD-RISC): Validation of a 10-item measure of resilience. *Journal of Traumatic Stress*, 2010, 20(6): 1019-1028.
- [38] 关啟亮, 黄召江, 李天畅, 等. 心理弹性量表简版 CD-RISC-10 在高职学生群体中的信效度分[J]. 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2(7): 127-131.
- [39] 周浩, 龙立荣. 共同方法偏差的统计检验与控制方法[J]. 心理科学进展, 2004, (06): 942-950.
- [40] 姚真. 中学校园欺凌: 发生与应对——以临汾 J 中学为例[J]. 法制博览, 2018(24): 230-231.
- [41] 刘思言. 父母及教师的性别角色期待、性别角色行为对小学生性别角色社会化的影响[D]. 延吉: 延边大学, 2020.
- [42] 刘宁宁. 小学高年级学生生活满意度培养对策研究[D]. 烟台: 鲁东大学, 2019.
- [43] 乔纳熙, 刘晓宇. 校园欺凌现状及其对生活满意度和考试焦虑的影响——基于 2015 中国 PISA 数据的分析[J]. 科教导刊(上旬刊), 2017(31): 191-192.
- [44] 朱清, 范方, 郑裕鸿, 等. 心理弹性在负性生活事件和抑郁症状之间的中介和调节: 以汶川地震后的青少年为例[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2, 20(04): 514-517.
- [45] 蒋玉涵, 李义安. 高中生心理弹性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11, 19(11): 1357-1360.